

乱世中的匪性、人性、诗性

——论四十年代师陀的未完成长篇小说《荒野》

罗维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基础课部, 湖南长沙, 410138)

摘要: 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师陀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荒野》以土匪为题材, 反映时代巨轮下的一类特殊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挣扎, 其渴望幸福家园的生命意识与现实生存的困境造成的悲剧性矛盾具有时代的普遍性, 但小说人物刻画的独特视角以及小说别致的意境和内蕴, 使它显得与其他的土匪叙事格外不同, 尤其是小说呈现出的匪性、人性和诗性交织的特点对于作品悲剧性审美意蕴的深化, 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审视。

关键词: 师陀; 《荒野》; 匪性; 生命意识; 诗性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5-0715-04

由于匪患是民国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 所以现代文学史上不乏表现土匪的作品, 并因土匪与乡村的密切关系而形成了土匪叙事的地域性和民俗性特点。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匪, 姚雪垠笔下的河南辘子, 东北作家群中的主要作家端木蕻良和萧军笔下的东北胡子, 李颀人笔下的四川袍哥, 艾芜笔下的西南马贼、山匪等等, 为我们展现出一次又一次鲜活、绚烂的民国时期土匪世界。本文要讨论的是曾被视为京派作家的芦焚后期的一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荒野》(这个时候他的笔名为师陀), 这也是一个关于土匪的故事, 因为它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和人物刻画的独特视角以及小说别致的意境和内蕴, 使它显得与其他的土匪叙事格外不同, 尤其是小说呈现出的匪性、人性和诗性交织的特点对于作品审美意蕴的深化, 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审视。

一、“乱世一平凡人生”在“原始性的顽强”中绽放诗情

《荒野》最早于1943年7月1日在《万象》月刊连载至1945年6月号, 共连载了15章, 未发行单行本。其时中国正逢乱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进占租界, 上海全面沦陷, 《万象》即是在1941年7月在沦陷区创刊发行的商业性文学杂志。而

师陀这时蛰居上海, 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 直到该台1947年秋冬之间结束文学节目, 这期间以“师陀”为笔名(原笔名为“芦焚”)写了不少小说。孤岛时期的师陀人生态度已然发生了巨大转变。《荒野》发表所用的笔名“师陀”是第一次使用在公开发表物上, 作者称其寓意为“我所师的其实是高地或小丘陵, 表示胸无大志”^{[1](220)}, 比起当年用芦焚作笔名, 取其英语“暴徒”之意, 师陀英雄主义的气概已经被普通人的自我体认和人生向往所替代。他在发表于《万象》第三年第一期的《华寨村的来信》中这样写道:“我看够了, 瘟疫, 饥饿, 两脚兽, 叫人忍受够了”, “我是一个小人物, 一个平常人。”显然生活的艰难, 社会的离乱, 人心的奸狡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过于高渺, 而开始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来面对现实。借他同一时期在《万象》上发表的小说《夏侯杞》里的人物夏侯杞之口, 师陀还表明了与之相应的创作观:“我们应该做到是去了解别人, 尽我们的可能, 了解我们认识同不认识的一切人。然后我们感到生命不同, 生命在向上长, 在追寻一个美的善的目的。于是我们得到启示, 我们的智慧增长, 我们从别人感到了生趣, ‘生命多可爱呀!’我们说”。作家的自我体认从英雄变成了凡人, 并进而影响到其对作品的表现, 所以在《荒野》中师陀才有可能深入到主人公的生命内部, 表达土匪头子二顺和娇姐在他们贫乏生活状态下心灵恣意

收稿日期: 2008-02-15; 修回日期: 2008-06-10

基金日期: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 罗维(1974-), 女, 湖南长沙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

绽放的诗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值得注意的是师陀人生观和创作观的改变并不是当时作家中的个别。

四十年代小说中有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即集体性地表现着一种平凡人生,发掘日常生活中的诗情。作家们在亲身体验和亲眼目睹了国家的内忧外患之后,一方面心怀亡国之悲愤忧愁,一方面更开始关注和同情那些有着“弱点和缺陷”却默默在苦难中挣扎生活着的“中国的老百姓”。正如废名借1947年自己所写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的莫须有先生之口道出的,对于内忧外患下的老百姓而言,“问题完全不在死的上面,在生的上面。……中国的老百姓的求生的精神是中国民族所以悠长之故”^{[2](37)}。这种被茅盾称为“原始性的顽强”的生命力量为当时的作家们所关注和表现。如路翎、孙犁、张爱玲、端木蕻良、萧红、沈从文等等小说家在四十年代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生命体验来纷纭表达日常生活的诗情,趋向于认可普通平凡的人生,发现并且肯定其中所蕴涵的特别的生命活力。

比如萧红以儿童天真寂寞的视角写《呼兰河传》中那些最底层的人们卑琐平凡而又顽强坚忍的原始人生。师陀在小说集《果园城记》中表现“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对这城与人的拨弄与压迫,以及在那些拨弄之下依旧平静满足的生活景象。张爱玲则用时代中平凡男女的故事表达人生的“苍凉”本质。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对那些沉没在生活底层者的内心意识有了较为平和的、爱怜的而同时又是辛酸的体味,‘哀矜而勿喜’,这样的情感在这个动荡时代也许是普遍的”^{[2](115)}。

而在《荒野》中师陀尤为可贵的地方在于,他选择的是土匪——一群特殊的乡下人来进行对这种求生精神的审美观照,并且在“原始性的顽强”生命表现中凸显出诗意,土匪头子二顺和娇姐的爱情在贫瘠单调的荒野废墟之上绽放出了下层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二、匪性—人性—诗性

这篇小说表现的是一类特殊的时代巨轮下的小人物——土匪。土匪是社会制度畸变和民不聊生的产物,其主体是农民,因为中国是以乡土为家的国家,一旦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存的手段,这时农民不是沦落为乞丐,就是落草为寇。如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所言,饥民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沦为盗贼,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进行生产性劳动获取生存资源,于是只好凭借暴力,获取暴力的酬报——血酬^[3]。在民国

时期,由于灾荒战乱,当土匪是迫于生计的农民可以想到的主要生存方式,当时农民为匪甚至到了“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为匪”的地步,可见农民和土匪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土匪离开了土地,但并未因此成为农民的异己力量,没有因为有朝为匪而脱胎换骨具备另一种文化载体。只要有可能他们还是愿意回归土地,重新做人。正如顾二顺对娇姐所说的:

我想种庄稼,或是作点别的出力事,能在本地固然好,要不呢,我就到外边去……我做一阵,我想:我累了,乏了,谁也别理我,教我安静的倒在大树下睡一忽;我出了满身汗,教凉土冰冰脊梁。

主人公顾二顺本是个庄稼人,因为哥哥顾大顺无意中输光祖传的土地和房屋后上了吊,没有了土地的二顺一怒之下杀了人,做了土匪,开始干绑架勒索,杀人越货的勾当换取血酬,并且威震四方,“成了地方上的恐怖”。同时他对于据点所在的白沙集百姓多行周济,算是土匪中的“义匪”。可作者并没有将故事写成草莽英雄的传奇,恰恰相反他似乎有意为我们揭去土匪那狰狞传奇的面具,露出他们平凡人的真相。在师陀看来他们根本无法抹去那来自田间乡村的身份,无法抹去内心对于平凡人性的渴望。二顺就是个匪性与人性兼有的复杂体,作者没有停留在匪性的层面上来表现这个土匪,而是通过他与娇姐的爱情,与四庚这个土匪二当家之间父子般的亲情,表现出他那朴素而尊严的人性。

小说的故事结构十分简单,因为没有写完,所写到的部分主要描写顾二顺和他的土匪伙伴在白沙集的土匪生活以及他与荒野人家的姑娘娇姐之间的爱情经过,最后部分写到了好不容易和娇姐成了亲的二顺却逃不过悲剧性的命运,被内奸和官府合谋使套捉到城里去了。如果掩卷回想,小说最能打动读者的一定是作者细细道来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过。这段爱情过程的抒写十分真切细腻,从最开始二顺与娇姐的富有浪漫色彩和刺激性的相遇到经过种种曲折最后成亲,师陀确实深入到了两个普通男女的生命内部,带着读者体验他们那朴素而尊严,甜蜜又苦涩的爱情心理。爱情中充满喜悦的二顺看到的荒野都和平时不一样:

看哪,今天阳光跟往日多么不同,它的光线多么像银质的,多么明亮,多么清澈——就是命定生长在这荒沙中的无知草木,今天也灵动的笑着,摇摆着,颤抖着,彼此招呼低语,神情上显得有多愉快!

这些荒野中的草木仿佛就是他们自身的形象写照,虽然只有“无知”的生存,却因为爱情的光辉而有了生命意识,“灵动的笑着”,“颤抖着”的正是荒野人

们被美好情感触动的灵魂。

三、向荒野凝眸——虚无的好梦——悲剧性的审美意蕴

在《荒野》的意境和意蕴中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这一方面体现在作者师陀一向所钟爱的表现空间——荒野废墟意象。“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4]，这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师陀在其小说《巨人》中的话。和沈从文一样自称“乡下人”的师陀对于废墟和荒原有着独到的表现力。朱光潜曾说过师陀的小说有着“爱描写风景人物甚于爱说故事”的艺术特征^[5]。小说中的荒野人烟稀少，漫天黄沙，单调、萧疏、贫瘠。这荒野其实就是主人公生命状态的隐喻，为生存而挣扎的生命是如此的枯竭贫瘠而又顽强不屈，当二顺的爱情得到了娇姐的回应之后，他觉得荒野和平时不同：

过去它们跟他全都很熟悉，现在他却觉得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从他心里唤起一种欲望，新的欲望，他觉得这地方是他的，他要永远保有它，他要像小树像草一样在这里生根。

好像生命有生以来第一次才真正属于他自己，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已经使这个蒙昧的农民从生存的层面跨越到对梦想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悲剧也正是从此刻开始。师陀深情地向荒野凝眸，捕捉荒野废墟中顽强生长的人性和诗性，如果联系师陀所处的时代，这荒野也正是人性荒凉的乱世之喻。

另一方面生活在乱世中的人们在无从由自我支配人生的状态下，面对命运这个巨大的主宰力量，显得渺小、平庸、脆弱，而且无所依凭。故此师陀四十年的小说中多有两类人物，一类是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拨弄和压迫下的默默承受和满足着的人；一类是拒绝这种命运的背叛者。前者让人感到悲凉，后者却在悲凉之中具有一种不妥协的悲剧美。这种悲剧性来源于无常、无告、无望的人生感受与渴望美好生活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之间的矛盾。《荒野》中的主人公顾二顺属于后者，他的悲剧就在于对于命运的不屈，他以渴望爱情的方式来背叛自己作为土匪的命运。作者师陀在小说中用舒缓的节奏、优美的笔致、细腻的笔调强化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过。最为动人的是在爱情的高潮部分二顺对娇姐表白的场景：

“我多，多么喜欢你……”他终于挣出了半句。

“你……”她推开他。

现在两个人是真的面对面了，这一瞬间可以决定

他们的一生。他们脸上同时现出紧张，或是说受了娇姐的影响，二顺同时现出紧张。他们相对的站着，对峙着，互不相让的望着。时间过去了。她心头可能掠过一影子：“他要赖吗？”但是这时候一点极轻微的声音一个小动作就能把他们解救下来，就能将紧张松散……他们脸上的光线忽然变柔和了，她的头低下去了。

……

二顺脸红了，光彩的，鲜亮的，像早晨的天空。

笔者以为，对于爱情的描写，尤其是对下层平民的爱情表现，这篇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多的佳作之一。唯其如此，他们悲剧性的命运更加凸显，打动人心。

爱情以及爱情对象娇姐成为了他的梦想的依托。这个梦想就是娇姐之口说出的平静温暖的家庭生活，而这是身为土匪最无法实现的梦。兼具农民和土匪性格的顾二顺向命运抗争，想跨越理想和现实的沟壑，但遭到的是身心的惨败。成亲后的家庭生活因为娇姐母亲流光大娘的愚蠢唠叨造成二顺和娇姐的负气，命运终于开始向他露出狰狞面目。二顺从家里出走，如在梦游，一切都成了“过去”，“那些平和的遥远的响隐在青纱后面的但却是清晰的永不再回来的过去……”，“他觉得他好久以来抱着的那个好梦断了”，“心里有一种孤单的被遗弃的感觉”，就在恍恍惚惚中，他遭了暗算，被出卖给了官厅。

我们看到二顺的努力在乱世之中成为枉然，原以为和娇姐的成亲能够实现梦想，但终于他发现对于他而言那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的好梦罢了。若将二顺的命运再放大，那么不仅仅是他，乱世毁掉了多少普通人渴望美好家园、渴望美好人性人情复归的梦想啊。在对历史对人生的感悟中作者体会到了其中的悲剧性，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荒野》不仅是沦陷区普通百姓的向往与痛苦的曲折反映，同时注入了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因此，这样的悲剧，就不仅具有‘国难毁家’的时代内涵，更是揭示了超越时代的人最终无所归宿的生存困境。正是这双重的困扰构成了《荒野》的底蕴，《荒野》这部长篇小说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深厚感与说不出的意味”^{[1](245)}。

总体来说，《荒野》的艺术魅力在于顾二顺的命运悲剧是来自时代和社会的，但小说并没有进行直接简单的控诉和批判，我们分明从中感受到小说在人性层面的诗意发掘和悲剧氛围，主人公们总是在心灵上弥漫着一种无依靠的迷失的感觉。师陀的悲剧色彩是淡淡的，行云流水的，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悲悯色彩。他

深情地关注着下层人的价值和命运，即便是置身于荒野中的一无所有的人们，也仍然绽放着动人的诗情，确实体现出师陀“悲情乡土”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 《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M]. 收

《钱理群讲学录》.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 范智红. 世变缘长——四十年代小说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3] 吴思著. 血酬定律[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229.

[4] 师陀. 里门拾记·巨人[A]. 师陀全集(第1册)[C].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127.

[5] 朱光潜. 朱光潜批评文集[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Banditry nature, humanity and poetry in times of chaos ——About Shi To's unfinished novel "*wilderness*"

LUO We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Huna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Changsha 410138, China)

Abstract: Shi To's unfinished novel "*wilderness*" used bandits as a subject matter, reflecting the struggle of a special kind of the humble under the wheels of the times. The tragic contradictions made by the keen sense of a happy family life and the plight of survival ha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times. With the unique perspective and intrinsic artistic conception, it is very different with other narrative of the bandits. In particular, it is a novel showing a great deal of humanity and poetic-cutting works for the tragic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epening of Meaning, which 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nd look at.

Key words: Shi To; "*wilderness*"; banditry nature; the sense of life; poetry

[编辑: 汪晓]